

创客：中国 Maker(一)

创客素描：被创业改变的人生

■ 陈舒扬 报道

2014 年 9 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,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次发出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的号召。此后,李克强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、国务院常务会议等各种场合多次阐释这一概念,直至其进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。虽然创富故事早就广受追逐,但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作为官方倡导概念的提出,依然有着特殊的意义。已经有官方评论文章设问: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“可否与当年联产承包制的重大效应相媲美? 能否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新引擎,并由此推动形成百舸争流、奋发有为的改革开放新局面和经济社会新气象?”

在北京,一批具有不同背景的创业者向记者讲述了他们的创业故事。

一场有预谋的开始

记者:能否简单描述一下你创业的内容,以及进展。

李华光(1968 年出生,北京律和同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):我们是一家提供互联网在线法律服务的科技公司,正在打造一个垂直的综合法律服务资源整合平台。通过互联网,我们尝试将人们潜在法律需求挖掘出来,培养人们使用法律服务的习惯,引导公众用法治思维理智处理问题;这个平台同时也为律师打造一个新的交流和展业方式,用大数据思维帮助法律人。

具体地说,比如我们通过“口袋军师”APP,汇集大众的法律需求,对这些需求进行数据化的分析,研发普适的法律产品。我们也在尝试跟不同行业结合,定制相应的服务产品。我们把“律生活”网定位为我们法律服务产品的电商平台,这些将和我们正在开发的其他产品连接,形成一个法律服务相关的生态圈。

王欢(“85 后”,北京融心科技有限公司):我们于 2014 年 6 月 28 日正式注册了一个叫做“我的小孩”的 APP,现在大概 5000 个用户。今年 2 月份完成了天使轮融资。

这个 APP 可以帮助家长和老师更便捷地沟通、帮助学校更高效地管理。比如家长能够通过教师发送的文字、语音、图片和视频,随时了解宝宝在园表现,也为幼儿园的早点检管理、信息发布、亲子活动布置等提供了新渠道。

苏元(1987 年出生,北京铀尼科技有限公司):我们做的是一款基于云端的数据管理平台。以表格形式进行云端的数据管理在国外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的趋势,在国内尚属首创,但我们相信中国人也可以在云数据这一块做到世界领先。现在我们已经在进行 pre-A 的融资,产品上线一年左右,各方面稳定,且受到广泛好评。

■ 黎广 报道

“要不然你找个时间,约他见个面?”广州市某区科技局局长甘宏宇征询记者的意见。

甘宏宇所指的“他”,是深圳市尚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(下称“深圳尚昆”)的董事长谷尚昆,一位身兼好几家创业公司的董事长,拥有自己的员工、工厂和专利的企业家。这位“OBE(生物降解塑料)”、“液态甲壳素”等国家专利的持有者,在 2014 年初又发明了一项用于公共安全管理的瞳孔识别技术。

“在数据库健全的基础上,这个技术如果用在公共安全治理上,比如用在监控里,就绝对从成本和效率上秒杀现在的人工安检。”甘宏宇说。作为一个科技迷,他对于这套基于瞳孔辨识身份的技术普及极为感兴趣。

2014 年 11 月 25 日,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《全国地方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总结评价报告》显示,广东省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总体得分在全国各省(区、市)中排名前列,创造、运用、保护、管理、服务水平全面提升,其达标分值均处于全国高位状态;而在同年发布的《2013 年全国专利实力状况报告》和《2013 年全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报告》中,广东省连续三年位居全国专利综合实力状况排名第一位,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指数全国第一位。

“在过去几年,广东在科技创新领域确实有着长足的进步,尽管现在锋芒不如以前,但早期的创新成果,正源源不断地反哺着地方经济。”甘宏宇说。

应用是对专利最好的奖励

“那是 2013 年中国技术市场协会给我发的金桥奖。”谷尚昆指着放在办公室的书柜里、显得不大起眼的一块奖状对记者说。这块两年才颁发一次的奖项,旨在奖励全国技术市场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和优秀科技成果转化项目,是全国技术市

记者:你创业前在做什么,为什么想到要创业?

李华光:我曾经在检察院工作,2005 年辞职做律师,还跟人创建了律师事务所,2009 年成立了现在的公司。

我很早的时候就有在中国推广“私人律师”的想法。人们往往官司缠身才想到找律师,事实上,培养人们的消费法律意识和习惯是个艰难的过程,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努力让人们了解并相信:法律不是为了惩戒,不是为了诉讼,它的价值在于为人们创造更加快乐安康的生活。随着公众法律意识的提高,特别是 2010 年之后互联网和电商的迅速发展,我们意识到,互联网和法律结合将会引发法律服务的创新,而我们一直探索的针对公众的法律服务模式也日渐清晰,又时逢依法治国方略确立,这种情形让我们兴奋不已。事实上去年我已经没有再从事律师工作,做了一个减法,全心放在公司上。

王欢:2009 年本科毕业后,我就进入普华永道做企业内部控制和财务管理类咨询工作,2011 年 6 月到联想控股旗下的弘毅投资从事投后管理类工作,两份工作让我积累了多方面经验。受父母的影响,创业的血液应该是流淌在我的身体里的,我一直在等待机会成熟。可以说,我的创业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开始。

苏元:创业前我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,之前供职于国家电网和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。在我研究生毕业的酒会上,我结识了我的合伙人,他对我说了一句话:你和我一起创业,你的成长是你在大公司成长速度的三倍。这句话,加上我自己的性格、追求的生活,让我在进入大公司还是自己去“开疆拓土”中选择了后者。

做一个连续创业者

记者:你是,或者会成为连续创业者吗?为什么? 创业改变了你什么?

李华光:应该可以这么说。从检察院到律所再到现在的公司,我没有离开法律这条主线。刚从体制内出来的时候,对商业还浑然不知,通过开办律所获得了各方面的管理能力,现在的工作面临更大挑战,有太多需要学习。我认为持续创业对心态和性格是一种磨练,我喜欢这种状态。

王欢:现在(在做的)是第一个项目,所以还不是(连续创业者)。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连续成功创业者,但“连续”、“成功”都很难界定。如果从产品层面上来讲,我们一定是在连续创业的,必须不停地去更新产品以满足市场、用户需求;从公司层面来讲,我也希望自己是一个连续创业者。

创业让我从一个“养媳妇的人”转换成了“被媳妇养的人”。但从精神层面来讲收获多。

粤式科技创新：珠三角未来十年的样板戏

场行业的权威奖项。

“当时,我的 OBE 项目刚刚成型,并拿到国家发明专利,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当年在调研项目的时候,发现这个项目意义深远,便给我颁发了这个奖项。直到今天,我们这个项目在国际上仍是领先的。”谷尚昆说。

OBE 指的是生物降解塑料母粒,在生产过程中添加到传统的塑料膜后,塑料膜透明度和强度不发生改变,废弃掩埋 90 天后可分解 90%以上。

“这个项目对于环境治理有着积极的意义。并且我们所说的生物降解,并不是使用粮食作物(为原料)原有可降解塑料使用的原料为淀粉。记者注),因此不存在占用我国粮食产量这个问题;而对于企业来说,更重要的是其生产成本可以降低至少两成。”郭鹏毅博士向记者解释。

郭鹏毅,这位出生在台湾的博士,在 2008 年获得了台湾发明国光奖奖章,并入选了 2008 年台湾杰出发明家博学博士。如今,他是深圳尚昆主管产品研发技术的副总裁。关于 OBE 项目,郭鹏毅表示,由于目前中国政府对环境治理空前重视,所以这个成果很受社会各界的重视。稍微留意一下,便会发现从企业到各地政府,都在对传统的白色污染进行治理。

“比如 2014 年末,我们的项目在贵州毕节落地,当时和我们签合同的是毕节市委副书记、市长陈昌旭,现在我们在毕节的工厂已经有 5 万平方米了。又比如吉林省,在 2014 年 2 月 7 日第 2 次常务会议就审议通过了《吉林省禁止生产销售和提供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、塑料餐具规定》,并且出台了《吉林省禁止生产销售和提供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、塑料餐具规定》,规定已经在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这对我们这些发明创造者来说是非常大的鼓舞。”郭鹏毅说。

珠三角是一个大孵化器



不停接触各种人,听他们去说自己心中的梦想与未来,也让我认识到了这个社会的强烈差异、摩擦、碰撞甚至是冲突,也更加坚定了通过自己在技术上或设计上的那一点小创新,去影响一些人的生活的愿望。

苏元:会(成为连续创业者),因为我有成功的欲望。创业让我更自信了,不再像以前在大公司里一样会刻意压抑自己,让我感觉到自由和轻松。同时我的朋友有时候也说我变得更犀利了,也许是在有些时候变得更直接而不迂回了。物质上没有大的改变,还很匮乏,我们还在起步阶段,路漫漫其修远兮。

记者:你认为是什么使创业在中国成为了潮流?

李华光:创业是否成为潮流不好说。改革开放以来创业始终存在,当然这两年互联网的发展为各个人群各个业态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,我想这是人们感觉到创业成为潮流的重要原因吧。

王欢:其实我并不认为创业成为了一种潮流。我能说因为中国人喜欢赶时髦和赶潮流么?软银赛富阎焱曾经说很多 90 后创业者赔掉了父母一生的积蓄,很难听,但是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。从爷爷奶奶那辈人只能种地,到爸妈那辈人只能进国企,到我们这辈人能创业,这说明社会进步和发展让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。在资本层面上,那些“创一代”在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后,更多的天使投资人和早期投资基金出现,有钱就要花出去,而三分钟拿钱和大把花钱的故事总是让人们津津乐道,也让媒体趋之若鹜。

要鼓励,更要支持和保护

记者:对李克强总理提出的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概念,你有什么想法?

李华光:我想这首先代表政策层面的包容和开放,也蕴意着由此而带动的其他变革。其实我们早年一直强调培养孩子的创造能力,用素质教育,而反对应试教育。但我想那只是一个理念层面的铺垫,如果社会没有

一个创新土壤,没有创新环境,没有各种可能性的释放,教育的创新也只停留在理念上。

王欢:创业和创新不是一个概念,政府的提法是好的,政府想要解决就业问题。但同时政府部门对民营企业的服务也要进步。

记者:你觉得“创业”是个什么样的词,正面,中性,或负面? 为什么?

李华光: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褒义词,一个向上的词。但不是说创业适合所有人。创业被更多人接受,代表了社会多元化发展和价值观的改变。

王欢:我觉得是中性。

苏元:创业于我而言是正面的,而我父母亲友而言可能是中性甚至是负面的。道理不言而喻,因为父母和亲友们认为创业就意味着不稳定,没有保障、没有公积金、没有户口,空有理想。

记者:你对创业环境有什么期望或评价?

李华光:其实现在我们已经读到了特别好的信号。我希望不仅仅要鼓励,还要支持和保护创业,比如在知识产权和税务政策上的支持和保护,针对不同的行业还需要制定更具体的实施细则。如果法律环境没有跟上,创业创新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负面因素可能会毁掉创业者,引发对创业模式的质疑,最终会抹杀社会创新。比如我们看到一些电商网站假货泛滥,以及其他创新活跃的领域的纷乱现象。法律总有滞后性,立法者应具备超前意识,为未来可预期的法律问题确定基本原则,保护创新发展。

王欢:政府要尽量能够公开公平,比如开门营业,租了办公室,消防手续变更要 3 个月,从装修结束之后,才能入驻。这个时间太长了,搬进去的话会直接贴条罚款,那 3 个月的房租谁出?

苏元:评价谈不上。我觉得创业环境确实越来越好,政策、配套环境、资本市场等方面均是,但是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在创业者的社会福利保障方面,希望能做得更好;另外希望能将社会资源统筹规划起来,有效地服务于整个创业人群。

能会达到 2840 亿美元,较 2012 年增长 22%。相比之下,美国同期的研发支出仅增长 4%,为 4650 亿美元。该机构预计,到 2018 年,中国在研发方面的支出将超过欧洲,到 2022 年将超过美国。

对此,普华永道(Pricewaterhouse Coopers)的合伙人莱特(ColinLight)表示,中国企业向来是迅速的跟风者,但现在已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。

这一趋势,更多地出现在长三角和珠三角。

2014 年 12 月 15 日广东省社科院发布的《中国区域孵化能力评价研究报告》(下称“《报告》”)显示,在中国 20 个创新区域综合评分中,广州黄埔区和天河区均出现在榜单之中,而深圳南山区则超过北京海淀区、杭州滨江区,名列第一。

在 2014 年 12 月 18 日《福布斯》杂志发布的中国大陆城市创新能力排行榜上,深圳亦排名第一,而广州也挤进前十。

“珠三角一项隐形的优势就在这:广州是省会,改革开放前沿;东莞是‘世界工厂’;而深圳则是特区。在这个有机的组合里面,一个城市面向政治中心,为创新提供政策支持,另一个城市负责研发,还有一个则是中国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,所以过去的十数年里,很多知名项目的初创在广州,比如网易,孵化成型后则走到了桥头堡深圳或者北京。”甘宏宇对记者说。

他顺便解释了前述《报告》中广州排名不前的原因:“因为在统计的时候,省社科院非常注重企业孵化,专利申请这几项硬指标。但从整体情况来看,广东在科技创新领域仍有大作为。”

“听说你的液态甲壳素在伤口愈合和抗菌上效果很好,在医疗和建筑涂料上,你们做过实验吗? 或者安排一个时间,我们见一面,顺便谈谈你说的瞳孔识别技术,我顺便研究一下你们这个技术的市场前景。”电话这一头,甘宏宇对谷尚昆说。